

梁晓声：作家如果不能超越自己 那也就是一个写故事的人(中)



当代作家梁晓声创作的长篇小说《人世间》

他始终秉持的创作态度和理念，更是对自己“一次又一次的叩问”过程：“假如我生活在那样的年代，会不会那样去做？如果不抗争也能生活下去，还要为了民族和国家出生入死吗？我自己的回答差不多是我没有这种能力。这需要牺牲精神，而我给自己的结论是几乎不具备这种牺牲精神。”

因此，虽然耗费了极大心血，力求完美，梁晓声依然觉得自己交出的作品是留有遗憾的：“无论我的笔怎样写，其实都和现实中那些人物所付出的牺牲有很大差距。我们的笔力在表现他们的理想担当的时候，其实是不够的。”不甚满意的另一个原因，还是来自年岁的无可奈何。作为梁晓声作品序列中时间跨度最大的一

部作品，《父父子子》没有以相匹配的体量来承载，即使成书有557页，已不算单薄。梁晓声对此非常清楚，因为这实际上是他有意变通的结果，小说在叙事上采取了不断切换视角的方式，以便在不破坏流畅和完整的前提下尽可能压缩篇幅。

“差不多要写到100万字左右，我个人觉得才能够把我愿望中的状态写好。但是我的身体担不起这样的爬格子劳动了。”

文学不是替自己诉苦的

尽管《父父子子》是一次全新的尝试，但不意味着它与梁晓声一直以来的书写岔路而行。从前，他笔下的角色虽然平凡甚至卑微，却无一例外地拥有着纯洁、善良、坚韧和正义的道德追求与精神力

量。这也是他在文坛甫一登场，便彰显出的风格独特的文学气质。

1980年代初，刚刚从苦闷和暗默中走出的中国文学，诞生了大量舔舐伤痕和反思悲剧的作品。这当然是一种宝贵的新生，却也不免显得有些感伤、颓丧和沉重。梁晓声的小说则提供了另一种观照：在勇于批判的同时，通过一个个热血儿女召唤着理想主义的光芒。他的笔端，绝不回避所有的苦难与丑恶，但更浓墨重彩地高歌崇高豪迈的旋律。

“文学不是把寻常生活中大家都经受的不中意的状态，夸大描摹成苦难，那是对苦难两个字的贬化。”梁晓声说，他的少年和青年时期一样经历过贫穷与无助，但那不能构成他理解中的苦难。对比失去了自由甚至生命的人们，轻言苦难只是一种自我想象，更是一种愚昧。“文学不是替自己诉苦的，要诉苦也是替别人。”

“他们笔下的主人公都是苦人儿，这成了一个写和读的默契，而且似乎写得越苦才越好。”梁晓声曾将这种状况总结为一种“好人文化”的缺失症候，认为我们

的文学作品缺少那种讲述“人在现实中应该是这样”的作品。某种程度上，他最初的写作正是对其时文学状况的背反：“我笔下的人物不仅仅是苦人儿，而是有思想的、有强烈的不被那个时代所左右的自觉。无论写《今夜有暴风雪》《雪城》《年轮》，我更在意的，其实都是写在特殊年代有一些知青——哪怕他们少到极少——身上呈现出来的不被共性表现所裹挟的个性。”

梁晓声说，他对个性的书写可以用“顽固”来形容，哪怕这种个性可能对许多人来说是一个挑战：“我不会竭力引起绝大多数人的共情感。总有声音在说，这不可能，我不是那样的、我周围的人不是那样的，因此你笔下的这些个性的青年形象是不存在的。事实上是存在的。我就是这样的，要知道我从复旦大学毕业时档案里都有‘和四人帮作过斗争’这样的鉴定。”

即使人到中年，这种个性仍旧在他的身上活跃着。回顾梁晓声的写作经历可以清晰地发现，中间有过十年左右的时间，他很少出产小说，而是更多地投入杂文，说言不公、直议现

实，出版了诸如《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忐忑的中国人》等一系列作品。那些年，小说家梁晓声仿佛暂时退场了，呈现在公众面前的形象变成了一个愤怒的知识分子。

说起那一阶段的转向，梁晓声为《中国新闻周刊》解释了缘由：“当时是一个各种矛盾复杂交织的时期，你很难通过一篇小说表达出直接感受，而且谋划一篇小说然后递出去，最快也得四个月甚至半年之后才能发出来，已经时过境迁了。（所以）面对着那样的社会现实，要快速、直接表达态度的想法很强烈，像鲁迅先生那样不断写杂文成为那一时期我的主要冲动。这种冲动压过了写小说的冲动。”

实际上，彼时的梁晓声生活已趋于稳定，文学带来的声誉和收益基本让他脱离了许多人在时代演进和社会转型过程中承受的压力。他的秉直，源自与生俱来的性格，也源自对身边人及众生的同情：“（压力）会在我的弟弟妹妹们的家庭生活中呈现出来，他们都下岗了”，更源自少年时接受过的文学滋养——他曾在托尔斯泰、雨果、屠格涅夫、普希金、